

湘鄂战争述评

● 王 斌

摘要:湘鄂战争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数不多的具有正义成分的局部战争。这场战争虽仅局限于湖北一省,但涉及湘、鄂、直、鲁、豫等省,范围十分广阔,其结果也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政局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,并间接地成为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前奏和导火索。

关键词:湖北兵变;驱王运动;湘鄂战争

中图分类号:E295 **文章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9—3451(2007)02—0094—09

作者:王斌,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

1921年7月至8月爆发的“湘鄂战争”,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数不多的具有正义成分的局部战争,虽然规模不大,时间也较短,但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政治影响,并间接地成为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前奏和导火索。目前,我国史学界对“湘鄂战争”的研究方兴未艾,但多从政治层面加以论证,从军事角度进行研究的却十分稀少。笔者不揣粗陋,拟从战争背景、战争导火索与驱王运动、战前准备、战争经过、战争影响等五个方面进行研究,有不当之处,敬请专家斧正。

一、战争背景

西方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《战争论》中指出,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”。可以说,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爆发的数十场战争无不与政治息息相关,“湘鄂战争”亦是如此。

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后,以曹锟、吴佩孚为首的新直系军阀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,一举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赶下了台,一跃而成为北京政府的主宰之一。正当曹、吴忙于与奉系军阀争权夺利时,湖南的自治运动和湖北的驱王运动风起云涌,一场大战迫在眉睫,为曹、吴扩充势力与地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。

护法战争以来,湖南多次成为南北战争的主战场,湖南人民普遍“厌战”,湖南的地方军阀为标榜“保境安民”,宣布脱离南北政府实行“中立”,即自治。1920年7月22日,湘军总司令(此时湖南废除督军改称总司令)谭延闿、暂编湖南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以湘军全体官兵的名义发表“谕电”,宣布湖南自治,并“郑重宣言”:
“湘人实行自治,以树联省自治之基,不受何方之干扰,亦不侵略何方”^①,当时即有门罗主义之称。

然而自治只是暂时解决了外战,却不能解决内争。当时的湘军内部分为谭延闿、赵恒

惕和程潜(曾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)三派,经过一番倒谭排程的激烈倾轧后,同年11月,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。赵恒惕(1880—1971),字夷午,又字炎午,湖南衡山人。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,曾加入同盟会。回国后,先后任协统、旅长,1916年任暂编湖南第一师师长,1920年11月任湘军总司令。赵恒惕上台伊始,即正式宣告湖南自治,并决定制定湖南省宪法,交湖南省议会议决施行。湖南的自治运动正式开展起来。当时湖南全省划分为12个防区,各防区司令视自己的防区为独立王国,他们在防区内截留税收、任用私人、把持行政。身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对此也是无可奈何。此时的湘军正规军亦由一师三混成旅扩编为两师十混成旅,使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兵多饷少的问题更加突出。赵恒惕不仅军令政令无法统一,还要时刻面对各位将领催饷的要求,深感焦头烂额。可以说,自治的招牌并没有给湖南的内政带来安定。为了解决内争,赵恒惕认识到只有通过向外发展才能摆脱困境,因此不惜抛弃自治宣言中“不侵略何方”的宗旨。

要想向外发展,不外乎北上南下东进西讨四个方向。北为湖北,南是广东,东邻江西,西傍四川。当时,广东是护法军政府的势力范围;江西为直系军阀陈光远的地盘,但地瘠民贫;四川陷于内战之中,纷乱不止;只有湖北不仅经济富有,又有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(汉阳兵工厂),如果占领了湖北,军械饷银都可解决。但由于在直皖战争前吴佩孚率师北撤时,曾与赵恒惕订有密约,即“吴撤兵后把湖南让归谭、赵,作为将来南北议和的枢纽,只能取得湘省为止,不得进兵侵犯北方势力范围,免为南北议和的障碍”^②;同时赵恒惕也意识到,一旦侵入湖北,直系军阀必将遣军援鄂,凭湘军的实力是不可能取胜的,因此颇为踌躇。

这时的湖北督军是直系军阀王占元。王占元(1861—1930),字子春,山东馆陶人。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。1895年加入新建陆军,任队官、管带。北洋六镇成立后,先后任标统、协统。1911年任陆军第二镇统制。入民国后,续任第二师师长。1914年任专办湖北军务。1915年10月授将军府壮威将军。1916年1月授将军府襄武上将军并督理湖北军务,7月改称为湖北督军,并一度兼任省长。1920年6月任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。王上任初期,鉴于皖系军阀势力庞大,为保住自己督军的位置,尚能收敛一些。自从直皖战争以后,王自认为对湖北的统治已经巩固,对以曹锟、吴佩孚为首的新直系军阀也有功劳(王在直皖战争中扣留了皖系军阀、时任湖南督军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,并解除了吴部的武装),湖北一旦有难,曹、吴定会伸出援助之手。同时他认为奉系军阀的主力远在关外,对湖北鞭长莫及;其他地方的军阀也无暇他顾,因此越发恣意妄为。他借口湖北省长何佩瑒私通皖系军阀,建议北京政府将其免职,并推荐其同乡与姻亲、时任湖北荆南道尹的孙振家继任湖北省长。1920年8月30日,大总统徐世昌下令,免去何佩瑒省长职务,特任孙振家署湖北省长。此令一出,湖北朝野一片大哗,掀起了“拒孙运动”,迫使北京政府改任平政院院长、湖北黄冈人夏寿康为湖北省长。王坚不同意,“迭电请假,以事挟制”^③,并派兵武力阻止夏接任省长,遭到湖北绅商的坚决反对。

王占元不仅在省长的人选上妄图让山东人上台,还大量任命山东人担当湖北省的县长。王占元曾说:“予待鲁人不薄,湖北六十九县,吾鲁人已占四十九。”^④舆论认为:“全省的县知事,山东人差不多占了一大半,若孙氏以山东人而长鄂,岂不要将湖北全省变为山东的殖民地吗”^⑤。省长人选的更迭与接印风波,以及山东人占有大多数湖北县长职位,

激化了湖北绅商与王占元之间的矛盾，他们决定效仿湖南自治，实行“鄂人治鄂”的湖北自治运动，“驱王运动”初现端倪。可以说，湖北的自治运动带有很浓的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。

二、战争导火索与“驱王运动”

王占元为人贪婪成性，大肆克扣兵饷，致使激起多次兵变。据记载，从1920年3月至1921年6月间，湖北的钟祥、宜昌、武穴、沙市、武昌、富池口、通城等地共发生20多起兵变，其中以宜昌、武昌的三次兵变危害最烈。1920年11月29日，驻宜昌的中央陆军第18师一部兵变，变兵大肆烧抢，宜昌的中外商家共损失数百万元，还“烧毁房屋壹百户，伤毙二十人”^⑥。1921年6月4日，驻宜昌的中央陆军第21混成旅第一团孙建屏部，因欠饷八、九个月，遂发生兵变。变兵四处抢掠，外商亦遭波及。旋经第21混成旅旅长王都庆率兵弹压，变兵始告溃散。6月8日，驻武昌的中央陆军第2师因欠饷发生兵变，变兵“放火抢劫，城内商店颇受损失，官钱局、造币厂亦付一炬”^⑦，共损失财产数千万，死伤数百人。王占元对变兵的处理方法是，诱骗变兵退役回乡。旋即将参加兵变的变兵共1700百人遣送至孝感，“预伏机枪，一律击毙，幸逃无几”^⑧。如此大规模的枪杀变兵，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罕见的。武昌兵变后，王已是四面楚歌，“凡彼（指王占元）出有告示，必有人将‘王占元’三字挖去”^⑨。湖北人民对他的愤恨已达极点。“驱王运动”正式登台，并得到了湖北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。可以说，湖北的多次兵变，成为湘鄂战争的导火索。

湖北的“驱王运动”大体分为两派，一派是以黎元洪（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）、周树模（曾任北洋政府平政院院长）、屈佩兰（时任湖北省议会议长）等北洋官吏为代表，提出的口号是“鄂人治鄂”，反映出官僚资产阶级维护自身政治权利的要求。另一派是以李书城（曾任湖北护法军总司令）、蒋作宾（曾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）、孔庚（曾任山西晋北镇守使兼中央陆军第9师师长）等国民党人为代表，他们在“鄂人治鄂”之外，又进一步提出“废督去兵”的基本口号，反映出国民党人为争取民主、反对军阀统治、寻求政治出路的愿望。虽然这两派在基本口号上有些细微区别，但在驱王这一点上目标是一致的。黎、周、屈等人的做法是派人向北京政府请愿，要求罢免王占元，国务总理靳云鹏因惧怕直系军阀，故表示：“就法律论，王占元应当罢免；就事实论，尚未到罢免时机。”^⑩但他们并不死心，继续派人前往北京，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奔走于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，希望通过政治手段罢黜王占元，可是却屡遭拒绝。1921年6月22日，靳云鹏召开各部总长特别会议，决定“至王占元之地位，议决决不更动”^⑪，标志着以湖北官僚资产阶级为代表发起的和平“驱王运动”的失败。

李书城、蒋作宾、孔庚等人看到用和平手段不能罢免王占元，遂决定使用武力推翻王的统治。但他们手中并不掌握军队，无法达到目的，于是决心求助于自治运动的首倡地——湖南。

1921年7月3日，武昌律师公会副会长施洋来到长沙，公开呼吁湖南政府“予鄂人以实力之赞助”，“洋敢代表湖北三千五百万人民准备箪饘（食）壶浆以迎”^⑫。湖北省议会也致函赵恒惕：“惟有吁恳麾下，本救灾恤邻之旨，兴吊民伐罪之师，驱除横暴，以解倒悬。”^⑬李书城、蒋作宾、孔庚等人还亲临长沙，大力运动湖南朝野兴师援鄂驱王，并宣称，“如果赵

恒惕答应出兵援鄂讨王占元,……湖北以后协助湘军两个师的军费”^⑭。为打消湖南在自治宣言中宣布“不侵略何方”的顾虑,他们以“一国之中,必各省自治完成而后,一省之自治始得完成,断未有邻接各省不能自治,而一省独能闭门自治者也”为法理依据,劝说赵恒惕出兵^⑮。

湖北人士的这些举动起到了两个重要作用:第一,为赵恒惕日后出兵援鄂提供了是应鄂人“泣恳”请求的借口。第二,湘军中高级将领(如湖南第 1 师师长宋鹤庚、湖南第 2 师师长鲁涤平、湖南第 1 混成旅旅长叶开鑫、湖南第 8 混成旅旅长唐荣阳、湖南第 1 师第 2 旅旅长唐生智等人)普遍认为鄂王占元民心丧尽、军队涣散,取胜的把握很大,如能占有湖北,军饷与装备问题都能解决,所以都极愿一战。

虽然赵恒惕垂涎富庶的湖北久矣,但鉴于直系军阀强大的军事实力,又因为在 1921 年 3 月 1 日与王占元签定了《湘鄂联防条约》(其主要内容是双方各守疆域,不得侵略对方),所以左右为难。1921 年 6 月 23 日,前四川督军熊克武来到长沙,与赵恒惕密谈,最后双方决定:“川湘各出五混成旅”支持湖北的自治运动^⑯。因熊的游说,并允以川军相配合,赵恒惕下定决心出兵援鄂“驱王”。

援鄂之举显然违背了湖南自治运动精神的,赵恒惕却说:“我湘之于各省自治,实负有督促进行之责,义至正任至重也。”^⑰为了自身的利益,赵恒惕不惜践踏湖南自治的初衷,这就为今后新直系军阀派兵援鄂提供了口实。

三、战前准备

当时,湖南共有两个师 10 个混成旅又两个歩兵团,即湖南第 1 师(师长宋鹤庚)、湖南第 2 师(师长鲁涤平)、湖南第 1 混成旅(旅长叶开鑫)、湖南第 2 混成旅(旅长刘跃龙)、湖南第 3 混成旅(旅长谢国光)、湖南第 4 混成旅(旅长张辉瓒)、湖南第 5 混成旅(旅长吴钊学)、湖南第 6 混成旅(旅长陈嘉佑)、湖南第 7 混成旅(旅长罗先闾)、湖南第 8 混成旅(旅长唐荣阳)、湖南第 9 混成旅(旅长刘叙彝)、湖南第 10 混成旅(旅长田镇藩)、湖南陆军第 22 团(团长蒋锄欧)、鄂军歩兵团(团长夏斗寅),兵力达 6 万多人。湖北共有两个师 7 个混成旅,即中央陆军第 2 师(师长王占元兼)、中央陆军第 18 师(师长孙传芳)、中央陆军第 17 混成旅(旅长张联陞)、中央陆军第 18 混成旅(旅长赵荣华)、中央陆军第 21 混成旅(旅长王都庆)、湖北第 1 混成旅(旅长卢金山)、湖北第 2 混成旅(旅长刘跃龙)、湖北第 3 混成旅(旅长宋大霈)、湖北第 4 混成旅(旅长刘佐龙),兵力达 5 万多人。

从兵力的数量上看,湘军胜于鄂军;由于湖北据有汉阳兵工厂,鄂军的装备强于湘军。湘军虽军械低劣,但士气高昂;鄂军因王占元喝兵血、吃空额,加之大肆屠杀变兵,造成军心涣散、士气低落。赵恒惕认为,王占元虽为直系,但属于旧直系,与曹錕、吴佩孚为首的新直系关系淡漠,如响应鄂人的请求发动援鄂战争,推翻王占元的贪腐统治,曹、吴应不会出兵^⑱。为了慎重起见,赵恒惕还是派人前往河南的洛阳和直隶的保定游说曹、吴,希望他们不要插手“驱王”事宜。吴认为在由衡阳撤防北归时,王占元曾予以“借道”;直皖战争中,王占元亦曾出过力,又与自己是山东同乡,故对“驱王”之说颇不以为然,故而以种种借口拒绝接见。曹錕虽知王占元民心丧尽,但亦因顾虑同系缘故,不好表态。赵恒惕派赴洛阳的代表、时任湘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萧光礼因不得吴之要领而返回长沙,并将此情景告

之自己的好友宋鹤庚。宋为了打消赵恒惕的疑虑,遂指使萧光礼欺骗赵说:“吴佩孚对王占元久怀不满,只因同属直系,对于湘军出兵援鄂一举,不便公开赞成,只能默契于心。”^{①9}赵恒惕信以为真,认为吴既默许,必得曹之授意,如湘军援鄂“驱王”,曹、吴当不会出兵。为统一部下的意见,1921年7月20日,赵恒惕召开军事会议,讨论湖南应否出兵援鄂,结果得到了与会各将领的同意,决定组成湖南援鄂军。与此同时,新直系军阀也在密切关注着湖北的局势。当时,北有张作霖的奉军,南有孙中山的护法军,隐然对新直系军阀构成了南北夹击之势,如果湖北落入倾向护法军的赵恒惕之手,将形成很大的威胁。王占元虽为直系,但属于旧直系,与新直系关系很浅,而且已完全丧失了鄂人的人心,如继续维持其统治,只会打击曹、吴的威信,因此决定以“援鄂”为名派兵入鄂,将湖北拿过来。1921年7月中旬,曹锟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,讨论出兵援鄂问题。曹锟、王承斌(中央陆军第23师师长)、张福来(中央陆军第24师师长)、萧耀南(中央陆军第25师师长)等人,均主张以援鄂为名,夺取湖北。吴佩孚最后说:“我因王子春是北洋老人,对咱们都不错,趁他危急之时,把湖北拿过来,有点不好意思。……今天大帅和大家的意思既然如此,那就这样决定吧。”^{②0}会议最后决定,派大军南下入鄂,并内定由萧耀南(湖北黄冈人)接替王占元任湖北督军,以解决“鄂人治鄂”问题。

此时,湘军援鄂之说在武汉传播甚广,王占元十分惊恐。他深知,一旦湖南派兵进攻湖北,他的部队根本抵挡不住。为讨好赵恒惕,遂密派余范传(湖南人,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)赴长沙,“并携带现款十万元,子弹二十万粒,军米二千石,以王督之名义,赠与湖南赵总司令”。赵恒惕也虚与委蛇,说:“湘军决无出兵攻击湖北及有意侵略之举动,务将此意转达王督,万勿疑虑。”^{②1}王占元还拟召开鄂、赣、桂、湘、黔、川、滇七省联防会议来约束赵恒惕,但无果而终。

1921年7月21日,赵恒惕下达援鄂总动员令,并亲任湖南援鄂军总司令,宋鹤庚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军总司令,鲁涤平任第2军总司令。援鄂军共辖9个纵队、1个总预备纵队和1个鄂军步兵团,计:第1纵队(司令为湖南第1师第1旅旅长贺耀祖)、第2纵队(司令为湖南第1师第2旅旅长唐生智)、第3纵队(司令为湖南第2师第3旅旅长刘鏊)、第4纵队(司令为湖南第2师第4旅旅长邹序彬)、第5纵队(司令为叶开鑫)、第6纵队(司令为陈嘉佑)、第7纵队(司令为张辉瓒)、第8纵队(司令为谢国光)、第9纵队(司令为吴钊学),总预备纵队(司令为赵钺),并以夏斗寅部为援鄂军先锋。湖南援鄂军总计4万多人。暂厝于长沙的鄂籍人士也召开集会,通过了《湖北自治临时约法》,并依据该《临时约法》选举蒋作宾为“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”兼“湖北自治军总司令”,孔庚为“政务院院长”,夏斗寅为“湖北自治军前敌总指挥”,并发表通电强烈谴责王占元贪腐、残暴的统治。

此时,王占元已得到密报,赵恒惕决心发动援鄂“驱王”战争,于是拍发电报质问赵恒惕。赵恒惕致电王占元声明误会,谓:“敝部受人煽惑,局部发动,未及制止,比日即飭令撤退”,并派参谋长唐一斌为代表来鄂与王占元共商继续联防事宜。王占元回电:“执事如能约束所部,占元决不为己甚。”^{②2}24日,夏斗寅部进抵岳阳,并致电湘省各将领及法团辞行,以示不再返湘之意。

至此,王占元已确信湘鄂战争势不可免,遂一面召开紧急会议,布置鄂军防守事宜;一面急电保定,请求援兵。25日,新直系军阀在保定开会,决定趁此机会将湖北收入囊中。

会议计划分 5 路出兵:靳云鹗之中央陆军第 8 混成旅为第 1 路,萧耀南之中央陆军第 25 师为第 2 路,赵杰之河南混成旅(该混成旅为暂编河南第 1、第 2 两师中各一部组成,无番号)为第 3 路,张克瑶之山东第 1 混成旅为第 4 路,吴佩孚之中央陆军第 3 师为第 5 路,前四路总司令以萧耀南充任。当日,曹锟派靳云鹗与萧耀南两部为先头部队南下援鄂。同日,吴佩孚致电北京政府,表示愿自动援鄂。

26 日,赵恒惕在长沙举行援鄂誓师大会,声称是受鄂人所请才派兵援鄂,一旦王占元去位,即刻退兵。同时致电王占元,劝其“顺应民心,敝屣高位”。王复电称:“现复再电中央,力申前请,一俟有人接替,当即释戈解甲,归老田园。”^②27 日,北京政府派翔威将军周骏乘专车到鄂与王占元协商鄂边防务,并请王勿萌退意。同日,靳云鹗旅来到汉阳,旋进驻汉阳兵工厂。

1921 年 7 月 28 日,赵恒惕下达对鄂军的总攻击令,下午 3 时,夏斗寅部同宋大霈部在羊楼司开战,湘鄂战争正式爆发。

四、战争经过

湘鄂战争爆发时,湘军兵分三路向湖北杀来:中路以鲁涤平为司令,夏斗寅为前锋司令,由岳阳、临湘向蒲圻进攻;左路以唐荣阳为司令,由澧县向公安、松滋进攻;右路以叶开鑫为司令,由平江向通城进攻。鄂军亦以三路迎击之:中路以孙传芳为司令,防守羊楼司、蒲圻和咸宁一带;左翼以刘跃龙为司令,布防通城、崇阳;右翼以王都庆为司令,布防公安和石首一带。湘军采用中央突破的战略,鄂军亦取中央防守的战略。可以说,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爆发的战争几乎都采用以中央突破为主战略,一是因为清末民初时期的各种军校均采用欧美日本等国的教材(当时欧美日本等国都采取中央突破的战略),毕业生们自然将中央突破的战略奉为圭臬;二是北洋军阀不相信人民群众,自然无法开展游击战;三是北洋军阀采用征兵制,为防止士兵逃跑,军中采用了严格的统驭制度,不敢让军队分散开展游击战及其他战略。

7 月 29 日,北京政府召开军事会议,决定依新直系军阀所请派出五路援兵入鄂,并任命萧耀南为统率前四路总司令。当天,萧耀南率部进抵汉口,分驻刘家庙、谌家矶等处。30 日,徐世昌正式电令萧耀南为援鄂军前四路总司令。

同日,湘鄂两军继续在羊楼司一带激战。宋大霈旅 72 团潘守贞部夜袭湘军,夏斗寅佯退十里,潘追至朱鹤镇时,湘军伏兵从左右杀出,潘中弹负伤(不久死去),士兵死 300 余人,余众缴械投降。鄂军受此挫败,退走 80 里。羊楼司险要已失,赵李桥险要的守军受到溃兵的冲动纷纷后退,赵李桥旋即失守。孙传芳急电王占元:“天气酷暑,我军水土不服,死亡枕藉,兼以南风过大,御敌颇感困难,特令退出羊楼司待命,请速派队前来助战。”^③王占元为使孙传芳更加卖命,加委孙为新(堤)嘉(鱼)蒲(圻)通(城)警备总司令(警备总司令有生杀予夺之权),并任命中央陆军第 2 师第 4 旅旅长张俊峰为后路司令,中央陆军第 2 师第 4 旅第 8 团团团长穆恩棠为游击司令。同时王占元向前线各军下令,于次日向湘军发动总攻击。

虽然王占元下令进攻,但鄂军士无斗志,³¹日,羊楼司险要又失。8 月 1 日,王占元向萧耀南求援。萧向王占元提出要求,只有供给两个月的军饷及补给三千支来复枪才可开

往前线作战。王占元急忙发给该师军饷 17 万 5 千元,并由汉阳兵工厂拨付该师新式来复枪 3 千支。萧见王占元如此痛快,不得不表示坚决予以援助,并定于 3 日上午先派一个旅开赴前线。靳云鹗见此,亦表示将驻汉阳的该旅第 2 团开往前方助战。得到萧、靳两人口头上的许诺,鄂王顿感胆壮,遂向北京政府发电表示决心坚守防地,“俟我增援队伍开到,即行进攻”^{②5}。

2 日,左路湘军由华容县属焦山进占石首县属之调弦口,旋又占领华容县属塔市驿镇,扼守长江南岸。不久进击公安、石首两县,并连连获胜。

3 日,中路的湘鄂两军经过一天的休整后重又激战。王占元将中央陆军第 2 师第 3 旅第 6 团加入进来以增强进攻的力量,在赵李桥一带向湘军发动全面反攻。因当日为大雨之后,北风劲吹,湘军作战非常不利,兼以孙传芳亲至前线督战,鄂军反攻的势力十分勇猛,激战五、六个小时后,湘军不支,败退三、四十里,赵李桥、霸王山等要隘均被鄂军夺回,湘军扼守羊楼司一带待援。

4 日,右路湘军发起进攻,剧战竟日,终将通城占领。未几,又攻陷通山、崇阳二县,刘跃龙所部死伤溃散殆尽。

5 日,中路的湘鄂两军复行接战。宋鹤庚亲至羊楼司指挥进攻。此时鄂军伤亡惨重,已成强弩之末,虽有赵李桥高山险隘与精枪利炮,但抵挡不住湘军凶猛的进攻,时间不长即告溃败。湘军乘胜追击几十里,将前失之地尽数占领,鄂军退守茶庵岭,其头道防线已逼近蒲圻。中路湘军虽然获胜,但损失巨大。事后,鲁涤平谈及作战情况时说:“我们事前完全没有估计到王占元手下,竟有孙传芳这样一个肯打硬仗的战将,从七月二十八日打到八月五日,足足跟我们拼了八昼八夜,他的人马死伤过半,后面援兵不至,才给我们打跑了。”“我们虽然打了胜仗,却也死伤了二千多。”^{②6}

王占元在前线失利、直军按兵不动的情况下,急派杨文恺到保定面见曹锟,指望曹能维持其地位,但曹的答复却是:“子春二哥可以歇歇了。”^{②7}直军所谓“援鄂”的意图暴露无遗,鄂王也如梦方醒,感到援助他的直军比打他的湘军更可怕。

至此,王占元知道大势已去,于是急电北京政府请求辞职,同时派人将督军府中所有现款、行李一律护送至天津,还下令工厂赶制一百多口大木箱以备装载各种古董、玩器、字画等(王占元在湖北七年,共搜刮了一千多万元及大量的细软,其钱款分别储存于各家外国银行)。接到王占元的辞职电后,靳云鹏电询张作霖对鄂事的意见。张复电声明:“王占元既无维持鄂局能力,中央自可罢免,继任人物请就近与曹使磋商”^{②8},并表示无论以何人为鄂督,绝不过问。

6 日,王占元在军政联席会上正式宣布辞职,并致电北京政府,谓:“萧总司令按兵不动,靳旅不受调遣,……前线鄂军因援军不肯前进,纷纷向后撤退,大局不堪收拾……占元保境有责,回天乏术。请查照前电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。”^{②9}北京政府电复王占元,嘱其暂维现状,同时密电萧耀南,令其布置一切。萧即率部移驻武昌楚望台、两湖书院等处。

同日,中路湘军乘胜猛攻,适逢大雨滂沱,路滑泥湿,湘军冒雨前进,士气低落的鄂军见湘军来势凶猛,知不可敌,纷纷败退,弃茶庵岭而走。

7 日,靳云鹏特派陆军总长蔡成勋前往保定同曹锟磋商,决定以萧耀南继任鄂督,以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。当日,湘军续攻蒲圻,经过数小时激战,鄂军炮兵弃炮先遁,湘军夺

获山炮 4 门、炮弹 27 箱,鄂军步兵见炮兵败退,顿失斗志,节节退却,一直退至墨斗山,荆港铺、韩家山以及东西两路要塞音峰岭、紫金岭相继失守,下午 3 时,湘军进占蒲圻。

得知鄂军不断败退,曹锟急电萧耀南,令赴前方布置一切。萧即携赵杰率卫队乘车赴蒲圻,令中央陆军第 25 师第 49 旅第 97 团当晚进驻贺胜桥。

为使湖北人民少遭战祸,8 日,鄂籍要人黎元洪、周树模、熊希龄、张国淦、陈宦、饶汉祥等人纷纷致电湘鄂两省当局,希望湘鄂双方停战议和。但湘军岂肯让鄂军得到喘息机会,继续发动猛攻。左路湘军连陷沔阳、嘉鱼两县,鄂军王都庆部退至距离省会武汉仅 60 里之金口。中路湘军夏斗寅部又胜于中伙铺,鄂军退守汀泗桥。夏命令部下各执白刃浮河而渡,并亲率敢死队随后督战,前赴后继。鄂军势不可支,退驻离桥五里以待援军。湘军占领汀泗桥后亦已疲劳,而且援鄂之直军又源源而来,乃宣告停战。

1921 年 8 月 9 日,徐世昌下令免去王占元两湖巡阅使、湖北督军本兼各职,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,萧耀南为湖北督军,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。王占元之被免职,标志着湘鄂战争正式结束。

五、战争影响

湘鄂战争虽只进行了 13 天,涉及的范围也仅限于湖北南部,但造成的政治影响却十分深远。

首先,由于王占元的残暴统治,激化了与湖北绅商的矛盾。为推翻其统治,以黎元洪、周树模、屈佩兰等北洋官吏为代表的一派试图使用和平手段,由北京政府免王职务。但因北京政府的庇护,这种做法宣告失败。以李书城、蒋作宾、孔庚等国民党人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,只有通过武力手段才能达到目的。但因手中无兵,遂决定向湖南搬兵。湖南的赵恒惕却想借机占领湖北,以实现其执掌两湖的梦想。但表面上表示是应湖北人士所请“吊民伐罪”。可以说,湖北绅商本意是想请赵恒惕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赶走王占元,退兵后将湖北交给鄂人管理。但事与愿违,赵恒惕从一开始同意出兵时就计划将湖北收归囊中。可以说,湘鄂战争具有一些正义的成分,但最终又重新归于军阀之间争权夺地的混战。

其次,赵恒惕践踏了湖南自治时的宣言,为新直系军阀派兵援鄂提供了口实。赵恒惕试图通过湘鄂战争,达到称雄两湖的野心。虽然暂时实现了目的,却使自己直接暴露于新直系军阀面前。因赵恒惕拒绝撤兵,暴露了他欲统治两湖的私心,湘直之间很快就爆发了战争。在优势直军进攻面前,湘军无力抵抗,败退回湖南,湘军在湘鄂战争中取得的利益瞬间丧失,直军并进占湘北重镇岳阳,对湖南造成很大的威胁,从此湖南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。这一切,皆为赵恒惕自食其言所致。

第三,湘鄂战争最大的赢家是新直系军阀。湖北为“九省通衢”之地,如果新直系军阀占有湖北,北可与直隶、洛阳的直军相连,南可威胁湖南、四川、广东,处于进可攻、退可守的地步。直军在湘鄂战争中没费一枪一弹即攫取了对湖北的控制权,获得了战略主动性。

第四,新直系军阀攫夺了湖北之后,加剧了与奉系军阀的矛盾。当时,北京政府共设三个巡阅使(苏皖赣巡阅使已于 1921 年 1 月 7 日裁撤),即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、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和王占元的两湖巡阅使。战后,吴佩孚升任两湖巡阅使(原为直鲁豫巡阅副使),打破了直奉两系的权利平衡,新直系军阀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军事集团,在与奉系

军阀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上发生了激烈的对抗。随着矛盾的不断升级,半年之后即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。可以说,湘鄂战争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前奏和导火索。

湘鄂战争的性质由最初具有正义成分战争转变为军阀之间的混战,是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大环境分不开的。蔡和森当时就已指出:“力能进取的军阀,便倡武力统一,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(如曹吴),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,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,举省长(如川滇)。”“换过说,就是为帝者不愿众建为王,为王者不愿奉人为帝,……完全为军阀间一种斗剧。”^⑩湘鄂战争正是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的一种斗剧。

注释:

①《湘军全体之郑重宣言》,湖南《大公报》1920年11月8日。

②杜春和、林斌生、丘权政编:《北洋军阀史料选辑》(下册)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,第76页。

③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: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第3辑·军事(三)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,第466页、第470页。

④刘挫生:《鄂州惨记》,汉口交通印书馆1922年版,第10页。

⑤《反对孙振家之鄂闻》,《晨报》1920年9月14日。

⑥⑦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: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,第207页、第208页、第212页。

⑨《王占元仍图盘踞湖北》,《晨报》1921年6月25日。

⑩荣孟源、章伯锋主编:《近代稗海》第7辑,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,第14页。

⑪《王占元地位难动摇》,湖南《大公报》1921年7月27日。

⑫《鄂各界代表施洋致湘人泣恳书》,湖南《大公报》1921年7月4日、5日、6日。

⑬《总司令关于援鄂之咨文》,湖南《大公报》1921年7月29日。

⑭彭伯勋:《湘军援鄂的前因后果》,《湖北文史资料》第6辑。

⑮《鄂人尚不忘情于湘耶》,湖南《大公报》1921年7月3日。

⑯转引自邓野:《援鄂战争之史的考察》,《近代史研究》1984年第2期,第255页。

⑰《总司令援鄂之誓师词》,湖南《大公报》1921年7月29日。

⑱旧直系军阀是指以代总统冯国璋为首、“长江三督”为基本力量的军事集团,王占元即为“长江三督”之一。随着冯国璋和江苏督军李纯的相继去世,旧直系军阀实际上已不复存在。曹锟、吴佩孚自取得直皖战争的胜利后,形成了新直系军阀,虽然王占元与曹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同期同学,但毕业后两人各奔东西,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。

⑲⑳陶菊隐:《记者生活三十年》,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60页、第61—62页。

㉑张方严:《1921年直军援鄂的经过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41辑,第107页。

㉒㉓㉔㉕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: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·大事记》第7辑,第71页、第72页、第75页、第77页、第78页。

㉖章伯锋主编:《北洋军阀》第四册,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,第31—32页。

㉗杨文恺:《我在王占元幕下的活动片段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41辑,第98页。

㉘蔡和森:《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——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》,《向导》第2期。

(责任编辑 朱加荣)